

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 以明清时期东昌府为中心的考察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民间信仰与上层建筑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是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视角。明清时期东昌府境内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按照职能和属性,主要分为通祀神灵、灾害信仰、水神信仰、行业神、地方土神和先贤名宦信仰五大类。运河的流经及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使其民间信仰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其主要表现是水神信仰的盛行、商人商帮的参与以及名目繁多的乡土神灵。民间信仰对区域社会治理和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 明清;东昌府;民间信仰;区域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3-0080-07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信仰风俗以及一般的民众迷信等内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民间信仰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而且与上层建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展民间信仰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视角。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研究由于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开展相关研究更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明清时期的东昌府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黄河、运河在此交汇。和其它地区相比,民间信仰在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本文依据相关史料,以明清时期东昌府辖区(含东阿、阳谷、恩县、馆陶)为视角,在论述民间神灵庙宇构成及分布情况的同时,分析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及其成因,探讨信仰对区域社会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求在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同时,为当地民俗文化遗

产保护和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神灵庙宇的主要构成

中国民间信仰的多样性是最明显的特点。“中国的民间信仰从远古原始信仰传袭而来,崇拜对象漫无边际,涉及万事万物。不仅有天地、日月、星辰等自然体,还有风、雨、雷、电、虹、霓、云、霞、水、火、山、石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还有各种动植物等都在崇拜之列。与此同时,民间还崇拜人死后的所谓“灵”以及其遗骨、遗物、遗迹的“灵”;还崇拜人们赋予很多自然物或人工物以化形的“灵”或“精”;还包括崇拜幻象产生的多种职司各异的神灵;还崇拜被认为是附在活人身上的某种“灵”(或神灵、或鬼灵、或精灵);还崇拜所有人力所不及的幻想中的超自然力;还崇拜被认为不可抗拒的一种“天命”(宿命)等,不计其数,包罗万象。”^[1]

按照其内容和属性,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通祀神灵和民间俗神、灾害信仰、水神信仰、行业神、地方土神和先贤名宦信仰五大类。通祀神灵和民间俗神主要指的是民众普遍祭祀、与其生活密切相关

[收稿日期] 2016-11-28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研究”(16DLSJ07);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中的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J16YH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的各种神灵,包括城隍、关帝、东岳、碧霞元君、玉皇庙、真武庙、观音庙、吕祖庙、灵官庙等。灾害信仰主要指与各种灾害相关的信仰,包括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火神庙、风神庙、雹神庙、麻疹庙、瘟神庙等。水神信仰主要指的是因运河或水旱灾害而起,与治水、祈雨相关的各种神灵,包括金龙四大王庙、晏公庙、龙王庙(龙神庙)、漳神庙、二郎庙(清源庙)、三官庙等。行业神是从业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一定的标准,人为造出来的神祇,这些神祇包括传说中的神灵和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具体到东昌府则主要包括文昌祠、鲁班庙(公输子祠)、马神庙、仓神庙等。

地方土神主要相对城隍、关帝、碧霞元君等“全国神”而言,指的是地方特有的神灵,具体到明清时期的东昌府,主要包括博平的鲁义姑庙、阳谷的插花庙,寿张的十八郎庙、黑虎庙、胡台庙,东阿的鱼山神女祠、莘县的弁山庙等。此外,还包括各地各家供奉的灶王庙(灶君庙)、土地庙(土地祠)等俗神。先贤名宦信仰则主要包括对当地历史名人以及乡贤、名宦等群体的崇敬和祠祀。如聊城府治内的羊使君祠、铁公祠、僧亲王祠、忠臣祠、范公祠、双贤祠、宋公祠、程公祠、忠善祠、郝舒二公祠、杨公祠等,临清的黦国庄敏公祠、杜张二公祠、钟公祠、金公祠、李公祠、王烈士祠、平江恭襄侯祠、宜公祠,堂邑的张养浩祠、穆孔晖祠,茌平的四贤祠、鲁仲连祠、马周祠、张后觉祠、孟秋祠、王曰高祠,高唐的晋文公祠、斋别庙、东方朔祠,东阿的吴季子祠、黄石公祠、东阿王祠、桓肃公祠等。当然这种划分并不严格,神灵之间并非我们所想象得那么界限分明。以上划分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谈论具体神灵时,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龙王既是水神,又是灾害神。府城内的羊使君祠既可视为先贤名宦崇拜,也可将其看作治水人格神。博平的鲁义姑庙既是先贤人物,又是地方土神。

二、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影响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此外,每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不同,社会风俗各异。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不同地区的民间信仰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具体到东昌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水神信仰的盛行

运河的流经和频发的水旱灾害导致当地水神信仰极为盛行。宣统《聊城县志》记载聊城龙王庙有三处,一在城内万寿观,一在崇武驿北河东岸,一在李海务闸西。^{[2]34}龙神庙在城东南龙湾西岸,原名杨公祠,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改建。^{[2]34}大王庙在东关馆驿前河岸。^{[2]35}光绪《寿张县志》记载寿张县龙神庙在关圣庙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知县庄洪烈重修。^{[3]374}大王庙在关圣庙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知县庄洪烈划广生庙前基创建。^{[3]374}民国《清平县志》记载大王庙在戴湾西岸,颇为宽敞,建于河运盛行时代(即明清时期),祀运河水神谢绪。^{[4]239}兴隆寺在城西北八十里,工程颇大,始建于明成化年间,祀龙神,以备祈雨。^{[4]239}龙女寺:“在龙潭上,距城二十五里。”^{[4]240}按照功能和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信仰的运河水神和漕运保护神,如金龙四大王、晏公、漳河神等;一类是民间治水神和祈雨神,如龙神、二郎神赵昱、羊使君等。金龙四大王、晏公等运河水神的出现成为明清时期东昌府民间信仰的显著特色。虽然这些运河水神的主要功能是“治运”和“保漕”,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但也为沿岸民众所普遍接受,成为当地民众和外地客商共同的信仰对象。^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运河及漕运对沿线区域社会官民信仰的深刻影响。

(二) 商人商帮与神灵信仰

运河的流经刺激了沿岸城镇经济的繁荣,使得聊城、临清、张秋等沿运城镇商贸云集,商人商帮因此成为神灵信仰的重要群体。山西商人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最强势的商业劲旅。他们在对鲁西带来巨大的经济渗透的同时,也带来精神文化的冲击。他们对关公的信仰和崇拜,比任何人群都要功利和虔诚,他们将关公视同自己身家性命的保护神。每个商人的店铺里,都能看到关公的神龛或塑像,关公崇拜成了山西商家的标志。山西商人在山东,几乎每到一地都形成一股商业势力,并将其物化为“山西会馆”,而每座会馆必奉祀关羽。

聊城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古运河西岸,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是由山西、陕西商人为了联乡谊而兴建的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其大殿供奉的关帝。民国《冠县志》记载冠县山西会馆在城内西北隅,正殿为关帝,左右殿为福神、财

^① 有关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的研究详见拙文《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13页。

神,山西商人所建。^[5] 馆陶、朝城、阳谷、东阿等地也都建有山西会馆(见上表)。山陕商人们如此推崇备至地歌颂关羽,一方面是祈祷这尊乡土神给自己以更多的护佑,另一方面则是借塑造关羽形象来提高山陕人在侨寓地的地位。“在乡土观念浓厚的

古代社会,离井背乡的人在心理上总有一种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在现实社会中,也多多少少会受到土著人的排斥,因而他们需要有强健的精神支柱支撑他们在异乡坚持创业,关羽就是山陕商人保持强健精神力量的源泉。”^{[6]301}

表 1 聊城境内所建山西会馆一览表

Tab. 1 List of Shanxi hall built in Liaocheng

会馆名称	地址	创建时间	创建人	资料来源
山西会馆	恩县	道光	山西商人	光绪《恩县乡土志》
山西会馆	馆陶	乾隆	山西商人	光绪《馆陶乡土志》卷 8
山西会馆	南馆陶	乾隆	山西商人	光绪《馆陶乡土志》卷 8
山西会馆	冠县	道光	山西商人	道光《冠县志》卷 2
太汾会所	聊城	康熙	山西商人	聊城山陕会馆碑记
山陕会馆	聊城	乾隆	山西、陕西商人	聊城山陕会馆碑刻
山西会馆	朝城	清代	山西商人	光绪《朝城乡土志》
运司会馆	阳谷阿城	乾隆	山西盐商和盐运司	现存遗址
山西会馆	阳谷张秋	不详	陕西商人	现存遗址
山西会馆	东阿	道光	山西典当商	道光《东阿县志》卷 2

资料来源:李泉、王云《山东运河文化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 年版,第 196—197 页。

除崇拜关羽外,商人商帮崇祀的另一个神灵就是金龙四大王谢绪。商人商帮视金龙四大王为航运保护神,当人员、货物安全抵达目的地后,人们便认为这是神灵护佑的结果,故建庙祀神。聊城山陕会馆位于运河西岸,大殿奉关帝,南殿祀火神,北殿崇祀的就是金龙四大王。^[7]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杭州商人闻鏊等在汶河南岸的旧窖口渡创建大王庙,供奉金龙四大王,“壮伟可观”。^{[8]472} 随后,山西商人也集资修建金龙四大王庙。临清市博物馆藏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新建金龙四大王神庙碑记》称:“敕封金龙四大王,……威镇江河津流,率土敷储运保商舟,神功浩荡不容复赘,凡我西晋易闽赣者,咸荷顺风以护送,而大江鄱阳毫不为患,信仁圣之庇佑焉,为答谢金龙四大王的庇佑,西商们“捐资助金皆乐施,不假他募”,修成“大殿三楹,而殿之上又宗其楼焉,……灿然壮观”。^{[6]279} 康熙十四年(1675 年),山西茶商韩四维等又在卫河西浒的广济桥旁边创建了一座大王庙。州人董上新为作《广济桥西岸大王庙记》云:“茶船至清源(临清古称),或更舟而北,或舍舟而陆,总以输运西边,西边之人仰赖惟殷,是以诸商皆乐于修建王庙,非众力辐辏亦不能告成事”。^{[8]473} 张秋镇金龙四大王庙同样为山西商人所建,康熙年间重修。^[9] 商人商帮在酬神报功的同时,亦借助崇祀神灵增进了同乡情谊、扩大了

与当地社会的交流。

(三)名目繁多的乡土神灵

日本汉学家滨岛敦俊在研究明清时期的江南民间信仰时提到,与玉帝、东岳、关帝、天后、梓潼君、二郎神等闻名全国的神相比,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太有名的神,在地方史料中通常把它们记述为“土神”。他还进一步指出,土神是指在某地形成、有当地相应的灵异传说并在该地得到信仰的地方神,与其对立的概念可称为“全国神”。这里所说的地域范围有大有小,有村落层次上的土地神,也有乡镇、县级层次上的,甚至更为广阔的领域上的“土神”。^[10] 本文在借用这个概念时,范围有所扩大,既指东昌府特有的、在东昌府以外的区域较少记载的神灵,也指在东昌府境内某个县有记载而在其他州县甚至周边区域中极少记载的神灵。这些乡土神灵承载着地方历史和文化,因而比城隍、关帝、金龙四大王等全国性神灵有着更顽强的生命力,不但保留有庙宇的遗迹,相关祭祀仪式和风俗也大多传承至今。

羊使君信仰。羊使君是山东运河沿线区域中的水神,信仰区域主要集中在聊城,现在聊城仍有羊使君巷,这条街在明清时期是连接大运河码头与东昌府城中的主要街道之一。后晋开元二年(945),羊使君守博州(治所为聊城),历史确有其

人,但佚失其名。因城池被河淹没,羊使君为免百姓损失,以身投水而死,人们不久在羊使君街的小桥南发现其尸体,感其恩德,安葬羊使君于此,并立祠奉祀。在碑刻中,我们亦见到如此碑文:“身为牺牲,祷于洪水,洪水无知,没而后已。民思其人,立庙以祀。呜呼!伟功不书于史。”^{[11]189}清人谈迁在其《北游录》中亦言:“出寻羊使君、丁御史(丁志芳)二祠,俱东门外。羊使君,史失其名,五代晋开运二年,知博州。大水,城且陷,使君投水死,以请民命。”^[12]人们对其信仰,一方面为地方新增神佑之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百姓对水患的恐惧。

“任疯子”信仰。据相关资料记载,任疯子是阳谷张秋镇一带妇孺皆知的仙道一类的人物,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济公式的故事。任疯子墓位于张秋镇运河东岸。现存墓直径2.5米,高1米。墓前有石碑一块,高2米,宽0.8米,厚0.3米,正面阴刻行书“明蛻仙任疯子墓”,背面阴刻500小字“明蛻仙任疯子小传”,详细介绍了任疯子的家世及业绩。^[13]此碑2000年7月被聊城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附近村民筹资新建了任疯子庙,以示纪念。

冠县大郭庄托山奶奶庙会起源于明朝初期,是鲁西一带迄今为止发现的形式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庙会。每年过了二月二,村里的妇女就会自觉来到托山奶奶庙,为托山奶奶缝制神袍。缝制袍子的布料都是附近村里一些信奉托山奶奶的村民进献的每年都会缝制二十多身神袍,每身神袍足足有一丈多长。“烧袍”仪式在每年阴历二月十五午后一点多钟举行,会首将所有参加人员按固定顺序排好队,在神前烧香祷告后放炮出发。同时,高跷、花船、秧歌、花鼓跟随着队伍表演,整个大郭庄声乐齐鸣、热闹非凡。^①茌平县韩屯镇罗屯村西北的鲁义姑庙会民众为纪念具有传奇色彩的鲁国女子鲁义姑而举行的庙会,每年的阴历二月初六是鲁义姑的生日,这一天众多民众便会从四面八方赶到罗屯村鲁义姑祠,对鲁义姑进行祭拜,他们放鞭炮、上香、祈福、求子,千百年来经久不衰。^[14]

三、区域社会视野下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与上层建筑和民众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对区域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也有着深刻影响。

(一)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控制

祭祀神灵、修建庙宇成为地方官员灌输国家祭祀理念、实施地方社会教化的重要活动。临清城隍庙在州署东,明嘉靖年间,知州茆世亨与同知俞仲岳、祝应嘉,判官陆应图、顾岩、梁继等捐资重修。平湖人陆山《重修城隍庙记》中认为城隍有辅佐州官治理民众之责:“考城隍庙制之设也,神实司之,与州治相表里。……窃闻幽有神明,明有礼乐,其机一而已矣。幽则事神,明治人,其理一而已矣。以事神而使民,则弗虐;以使民而事神,则弗欺。神之得以食于兹土也,以福民也,以有司之尽其职也。有司之弗职,则将慢神;虐民,而祀典亦废。是以民之仰福于神,仰惠于有司。表里之责,虽为相等,而有司之不及又将赖神以相之。”^{[8]434-435}聊城城隍庙在府治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知府杨朝桢重修。邑人彭軫《重修城隍庙碑记》云:“郡侯杨公下车以来,首以兴教化为务。……仰见大殿寝宫圯坏不堪,喟然曰:‘事神不谨,及化民之道不备也。’爰捐俸重修。而十八邑令体公之心各愿输助,不数月,而焕然改观。”^{[11]187}

地方士绅也借修建庙貌传播自己的祠祀理念。博平县城东五里墩有关帝庙。乾隆二十九年,邑人李金枝《重修关帝庙碑记》云:“普天下莫不尊亲,通都大邑以及穷乡僻壤肖像而崇奉之者固无如关帝矣,赞颂之碑版,无不搜奇尽致以争,实与帝无与也。盖帝之圣神文武无须乎赞,亦实无可赞。……或曰如子之言,则帝不当祀耶!余曰吾诂谓帝不当祀者,但人不知所以祀耳!吾谓欲祀帝,宜知帝之为帝;欲知帝之为帝,仍以圣贤之语为归。夫子曰成仁,孟子曰配义,曾子曰大勇,子思曰至诚,谓之志士也,可;仁人也,可;君子也,可;大丈夫也,可。可显之为常人之固有,深之为至人之不测。仰之为日月之经天,俯之为江河之行地。苟吾心光明磊落,即帝心也;帝心即天心也,祀帝即祀天也。”^[15]

当面临灾害或动乱时,祭祀神灵成为地方官员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万历初年,东昌府知府罗汝芳重修府治城隍庙。“维时六月不雨,苗几槁,仆祷之,大雨连日,岁即用登。公(指罗汝芳)感神庥,遂奋然募工简材,聿修前制。”^{[11]187}堂邑县八蜡庙在东门外,康熙七年(1668年),知县张茂节重修。《重修八蜡祠记》记载:“康熙丁未六月,蝗飞蔽天,遗蝻复生,邑人大惧。茂节祷于祠,设法捕之。立程限、悬

^① 《“烧袍”祭神的冠县大郭庄庙会》,聊城新闻网,2013年3月12日。<http://news.lcxw.cn/zt/whlc/lswb/wwwb/2013-12-04/507520.html>。

赏格,得干蝗千二百五十四石,贮于仓,来春发民粪田,害类遂绝,岁实有秋。于是,新其祠而享之。”^[16]莘县弇山神庙在县治西北四十里马桥镇,祀弇山泉神。北宋崇宁二年(1103 年),敕封为“显仁王”,祷雨辄应。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知县曹煜、康熙五十年(1711 年)知县刘萧先后两次赴庙祈雨,皆获响应。^{[17]599—600}地方官员和士绅往往会在神灵“显应”之后,选择重修庙貌以答谢神灵,从中亦可以看出民间信仰的功利化倾向。

（二）民间信仰与地域文化认同

民间信仰在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具有显著功效,这在地方乡土神灵的祭祀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通过共同祭祀神灵,神灵所在地的民众逐渐形成一个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祭祀圈”。“祭祀圈一般是指以一个主祭神为中心,信徒共同举行祭祀活动所属的地域单位。人们透过共同神明信仰,举行共同祭祀活动,将地方上人群整合起来,维系一体的意识与感情。”^[18]“在祭祀神明之过程中,可形成之祭祀组织或活动逐渐成为凝聚居民命运共同体媒介。”^[19]“祭祀圈实际上就是地域文化的具现,它对塑造社区地方感、整合区域内民众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20]

冠县北馆陶镇大郭庄村民的祖先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从明朝洪武初年迁来。大郭庄的先民在黄河故道大郭庄安家后不久,就发现这个地方风沙特别大,风沙不仅吞噬了农田,还危及他们的生活。于是,他们返回山西,请来了“托山奶奶”。“托山奶奶”是这些先民在山西信奉的神,之所以叫“托山奶奶”,是因为她右手托着五座大山,并且举重若轻。请来托山奶奶后,大郭庄先民们在村西建庙供奉,并且在托山奶奶生日这一天(阴历二月十五)都要举行祭祀活动,祈祷托山奶奶的保佑。在托山奶奶庙内,除了供奉着托山奶奶,还同时供奉着“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大郭庄村民也称之为“麦黄奶奶”和“泰山奶奶”。不过,在大郭庄村民的眼里,即使是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也不能和托山奶奶相比,他们只能被供奉在托山奶奶左右。每年的庙会上,除了烧香、拜神、唱戏、民间文艺表演、商业活动内容外,还有具有地域特色的“烧袍”仪式。

龙王信仰由来已久,在民间有坚实的信仰基础,随着发展逐渐融合了地方文化的特质。张秋镇北海子村的龙王庙,被附加以“北海”之名,还附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秃尾巴老李”的传说。^[21]这个在当地流出已久的故事,将明代山西移民和始于清顺治年间的山东人闯关东的史实结合起来,赋予了龙王

降雨之外的另一种地域亲情。“这个龙王与保运的龙王故事大相径庭,在民间,龙不仅具有降雨的功能,而且是有情有义的神灵,更具有亲切感,容易被人们认同。”^[21]

（三）庙会与地方社会生活

庙会是村落生活的公共空间,它的形成最初与寺庙的宗教活动有关,是民众酬神的祭祀场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庙会的形态不断演变,庙会的功能也日趋多元化,从相对单纯的宗教空间,转化为具有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经济贸易等诸多功能的场域。

表 2 清平县境内庙会一览表
Tab. 2 List of Qingping county temple fair

地点	庙会名称	会期
城内	吕祖庙会	二月初八至十一日
城内	方公祠会	三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城内	城隍庙会	五月二十八至六月初一
城东关	娘娘庙会	四月初八至十一日
辛集	娘娘庙会	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康庄	娘娘庙会	四月十八至二十一日
十里堡	玉皇阁会	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刘芳庄	娘娘庙会	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
戴湾	娘娘庙会	二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
魏家湾	娘娘庙会	四月初八至十一日
魏家湾	真武庙会	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
二十里堡	关帝庙会	二月中旬
王集	娘娘庙会	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元伍营	娘娘庙会	三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刘庄	麻佛寺庙会	三月下旬
于林	娘娘庙会	四月初一至初四日

资料来源:民国《清平县志》第 4 册《礼俗志二·节序》,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 89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303 页。

庙会的经济功能极为显著。庙会一般在寺庙所在地举办,利用神祇、社火、神戏招徕顾客,是工商业者开展城乡贸易、进行物资交流的一种手段。庙会往往与庙市联系在一起,成为吸引周围民众进行贸易的场所。这一点实际上是华北地区庙会与江南地区庙会相比的突出功能。^[22]明清时期的东昌府因为庙宇众多,是庙会比较集中的地区。据《清平县志》记载:(清平县)庙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演剧赛神,年有定期,谓之庙会。每届会期则商贾辐凑,士女如云,车水马龙,奔赴络绎,极一时之盛”(详见下表)。道光《东阿县志》记载张秋镇“三月二

十八日祀东岳大帝,天齐庙演剧,远近香客云集,商贾因以为市,前后七八日甫散;”“十月十五日三官庙演剧,远近香客云集,商贾因以为市百货,前后半月甫散”。^[23]阳谷每年春季的四月十八日祀天仙,“结会治农具”。^[24]光绪《莘县志》记载火神庙每岁正月十六日、六月二十三日有会;真武庙每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会;吕祖祠每岁正月初八日、四月十二日有会。^{[17]468}临清境内庙宇数量众多,庙会亦是如此。民国《临清县志》记载:“临清庙会不一而足,如城隍庙则正月腊月及五月二十八日均有会,五龙宫则三月三有会,歇马厅则四月初有接驾会,碧霞宫则九月初有会。乡间之会黎博店在二月中旬,小杨庄在三月下旬,各会当中以西南关之四月会最大,邻近县于庙会前后均来赶趁,名曰‘进香火’,全市商业社会繁华所关甚巨。”^[25]

庙会的文化娱乐功能同样不能忽视。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风俗志》记载当地碧霞元君庙会,“四月十八日,碧霞元君会,倾城士女出供,香火自十五日至十八日,上庙者水陆不绝。明末,西北之民结社来观,如东岳故事。其灵爽讫于千里。每岁会资造金银五色纸宫殿为驾,前仪仗为鼓吹,为扮演杂剧,两城周游。市民设祭,以珠翠珍宝聘巧工扎饰玩具,倍极华丽,五日内共填街市。”^{[8]483}清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麟庆所撰的《鸿雪因缘图记》中亦有一则关于“临清社火”的记载:“碧霞元君圣诞(即农历四月十八日),远近数百里乡民,争来作社火会。百货俱聚,百戏俱陈,而独争高跷,尤为奇绝。蹬坛走索,舞狮耍熊,无不精妙。且鼓乐喧阗,灯火照耀,男妇宣扬,佛号声闻彻夜”。^[26]

四、结语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与有组织、有规范、有经典的官方信仰和宗教信仰不同,它的传播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渗透的,而非通过官方行政命令强制推广或宗教组织传播的。民间神灵信仰往往在其形成、传播、传承过程中,染上了特定的行政区域、自然区域色彩,成为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东昌府境内的民间信仰既有和全国其它地方相似的地方,如种类多样性、目的功利性和群体广泛性等,也有其显著的地域特色。其主要表现是水神信仰的盛行、商人商帮的参与以及名目繁多的乡土神灵。这些特点的出现,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民众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素息息相关,成为我们观察和了解区域社会的重要视角。

[参 考 文 献]

- [1]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1—2.
- [2] (清)陈庆藩修,叶锡麟、靳维熙纂.宣统聊城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3] (清)刘文燧修,王守谦纂.光绪寿张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4] 梁钟亭、路大遵修;张树梅纂.民国清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5] 侯光陆修,陈熙雍纂.民国冠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49.
- [6]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7] 陈清义,刘宜萍.聊城山陕会馆[M].华夏文化出版社,2003:86—87.
- [8] 临清市人民政府编.临清州志[M].济南:山东地图出版社,2001.
- [9] (清)林芑修,马之驺纂.康熙张秋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124—125.
- [10] (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什会与民间信仰[M].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6—7.
- [11] (清)嵩山修;谢香开,张熙先纂.嘉庆东昌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12] (清)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139.
- [13] 马殿民.任风子传奇[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326—327.
- [14] 王艳,张玉,刘银璐,林清,李晓桐.聊城茌平县鲁义姑庙会的传承与改善[J].山西青年,2015(24):11—13.
- [15] (清)李维诚纂修.光绪博平县续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99.
- [16] (清)卢承琰修,刘淇纂.康熙堂邑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24.
- [17] (清)张朝玮修,孔广海纂.光绪莘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18] 吴育臻.大隘地区聚落与生活方式之变迁[M].新竹县立文化中心,2000:125—127.
- [19] 张胜彦等.台湾开发史[M].台北:国立空中大学,1996:144.
- [20] 李凡.明清以来佛山城市文化景观演变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174.
- [21] 吴欣.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神”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9):112,112—113.
- [22]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219.
- [23] (清)李贤书修,吴怡等纂.道光东阿县志[M]//中国地方志

- 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 92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6. 2004:186.
- [24] (清)王时来修,杭云龙纂.康熙阳谷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 93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28. [26] 马清福.满族文学史:第 3 卷[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302.
- [25] 张自清修,王贵笙纂.民国临清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 95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 (责任编辑:闫卫平)

Folk Religion and Regional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Dongchang Prefectur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 Meng-f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n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Folk religion and superstruc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which makes it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observing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many types of folk religion within Dongchang Prefecture, which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function and attribute, they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universal worship of gods, religion of disaster, religion of water gods, religion of profession gods as well as religion of local gods, sages and famous officials. Access to flowing canal and special lo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culture make the folk religion show a significa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main performances of which include the prevalence of water gods, the participation of businessmen or business groups and numerous local gods. Folk religio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governance of regional society and people's daily lif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social changes in the canal region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ongchang Prefecture; Folk Religion; Regional Society

(上接第 67 页)

“Ash Heap”: The Change of the Collapsed Land and the Local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ENG Xian-l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change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aihu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used extensive concern of the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The various types of collaps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human activities affected the basic interes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the rulers of the dynasty proposed a great number of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system.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had reached a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s temporarily, however, due to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the balance was often broken. The competition of interests and tension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local despots and state officials had been clearly presented. In particular, the problem of water and soil subsidence became serious which was regarded as “ash heap”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t also affected the regional water conservanc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was normal that people competed with water for the fields and government competed with the public for profit, and it was also the due performance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survival pressure, which is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unty Administration; Ash Heap; Collapse of Rivers and Lakes; Local Society